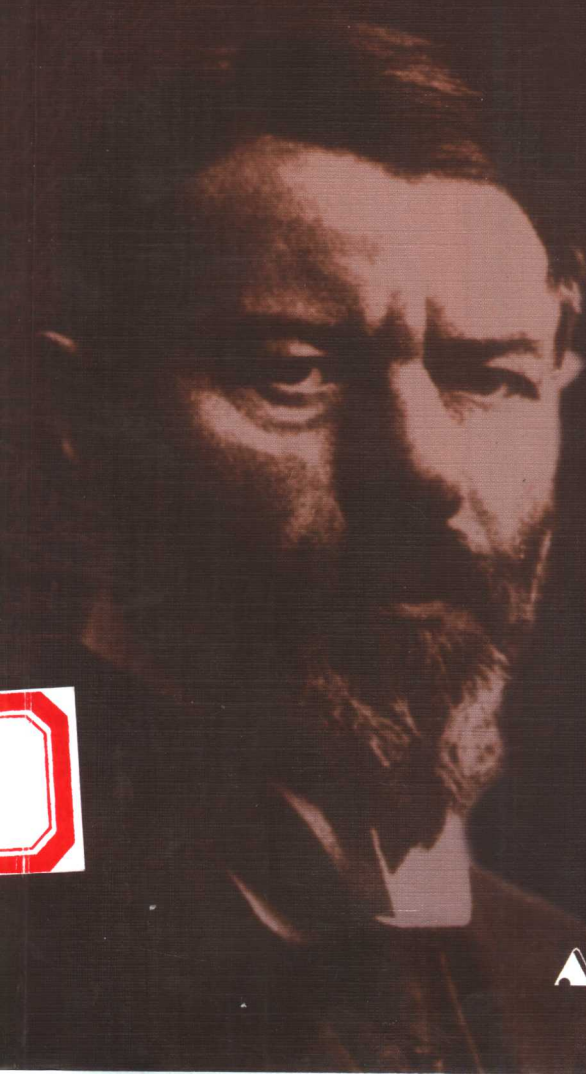


Max Weber

韦伯作品集

I

学术与政治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季伯作品集

I

学术与政治

钱永祥 林振贤 罗久蓉 译
简惠美 梁其姿 顾忠华

©2004 远流出版公司

本书由远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授权，
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 - 2004 - 06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术与政治/(德)韦伯著;钱永祥等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5

(韦伯作品集; 1)

ISBN 7 - 5633 - 4526 - 4

I . 学… II . ①韦…②钱… III . 社会学 - 研究
IV . C91 - 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667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 - 64284815

北京北关闸印刷厂印刷

(北京市通州区北关闸管理所院内 邮政编码: 101100)

开本: 880mm × 1 230mm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67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6 000 定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言

苏国勋

作为社会学古典理论三大奠基人之一的韦伯，其名声为中文读者所知晓远比马克思和涂尔干要晚。马克思的名字随着俄国十月革命(1917年)的炮声即已传到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并列以全集的形式由官方的中央编译局翻译出版，作为国家的信仰体系，其影响可谓家喻户晓。涂尔干的著作最早是由当年留学法国的许德珩先生(《社会学方法论》，1929年)和王了一(王力)先生(《社会分工论》，1935年)译介，首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两部著作的引入不仅使涂尔干在社会学界闻名遐迩，而且也使他所大力倡导的功能主义在学术界深深植根，并成为当时社会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和方法论。与此相比，德国人韦伯思想的传入则要晚了许多。由于中国社会学直接舶来于英美的实证主义传统，在早期，孔德、斯宾塞的化约论—社会有机体论和涂尔干的整体论—功能论几乎脍炙人口，相比之下，韦伯侧重从主观意图、个人行动去探讨对社会的理解、诠释的进路则少为人知。加之，韦伯的思想是辗转从英文传播开来的，尽管他与涂尔

干同属一代人,但在国际上成名要比涂尔干晚了许多。恐怕这就是中文早期社会学著述中鲜有提及韦伯名字的原因。

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内地学界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取消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又长期与国际主流学术界隔绝,直到改革开放后,1987年由于晓、陈维纲等人合译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北京由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问世,内地学者才真正从学术上接触韦伯的中文著作。尽管此前台湾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已出版了该书的张汉裕先生节译本以及由钱永祥先生编译的《学术与政治:韦伯选集(I)》(1985年,远流出版社),但囿于当时两岸信息闭塞的情况,这样的图书很难直接到达学者手中。此外还应指出,大陆在此之前也曾零星出版过韦伯的一些著作译本,譬如,姚曾真译的《世界经济通史》(1981年)、黄晓京等人节译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86年),但前者由于是以经济类图书刊发的,显然其社会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遮蔽,后者是一个删除了重要内容的节译本,难以从中窥视韦伯思想全貌,无疑也会减损其学术价值。

内地学术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引介韦伯思想固然和当时社会学刚刚复出这一契机有关,除此之外还有其重要的现实社会背景和深刻的学术原因。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是大陆社会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的年代,经济改革由农村向城市逐步深入,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社会转型必然会伴随有阵痛和风险,改革旧有体制涉及众多方面的既得利益,需要人们按照市场经济模式转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重新安排和调整人际关系。加之,由于中国南北方和东西部自然条件和开发程度存在很大差异,在改革过程中也可能出现新的不平等,还有随着分配差距的拉大社会分层化开始显露,以及公务人员贪污腐化不正之风蔓延开来为虐日烈,这些都会导致社会问题丛生,致使社会矛盾渐趋激烈。

如果处理不当,最终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失范。苏联和东欧一些民族国家在经济转轨中的失败和最终政权解体就是前车之鉴。这些都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遇到了新的瓶颈,面对这些新问题学术界必须做出自己的回答。

撇开其他因素不论,单从民族国家长远发展上考量,当时中国思想界可以从韦伯论述十九世纪末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著作中受到许多启迪。当时德国容克地主专制,主张走农业资本主义道路,成为德国工业发展的严重障碍;而德国中产阶级是经济上升的力量,但是领导和治理国家又缺乏政治上的成熟。韦伯基于审慎的观察和思考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出于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使命感和对历史的责任感,他自称在国家利益上是“经济的民族主义者”,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自我期许“以政治为志业”。联想到韦伯有时将自己认同于古代希伯来先知耶利米,并把他视为政治上的民众领袖,亦即政治鼓动家,他在街市上面对民众或批判内外政策,或揭露特权阶层的荒淫腐化,只是出于将神意传达给民众的使命感,而非由于对政治本身的倾心。然而韦伯又清醒地认识到,现时代是一个理智化、理性化和“脱魅”的时代,已没有任何宗教先知立足的余地,作为一个以政治为志业的人,只能依照责任伦理去行动。这意味着一个人要忠实于自己,按照自己既定的价值立场去决定自己的行动取向,本着对后果负责的态度果敢地行动,以履行“天职”的责任心去应承日常生活的当下要求。或许,韦伯这一特立独行的见解以及他对作为一种理性的劳动组织之现代资本主义的论述,与大陆当时的经济改革形势有某种契合,对国人的思考有某些启发,因而使人们将目光转向这位早已作古的德国社会思想家。

此外,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学术界以及周边国家兴起的“韦伯热”也对国内学术界关注韦伯起到触发作用。韦伯的出名首先在美国,这与后来创立了结构功能学派的帕森思有关。帕氏早年留学德

国攻读社会学，1927年他以韦伯和桑巴特论述中的资本主义精神为研究课题获得博士学位，返美后旋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译成英文于1930年出版，并在其成名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中系统地论述了韦伯在广泛领域中对社会学做出的理论贡献，从此以后韦伯在英文世界声名鹊起并在国际学界闻名。五十年代以后韦伯著作大量被译成英文出版，研究、诠释韦伯的二手著述也如雨后天春笋般地涌现。六十年代联邦德国兴起的“韦伯复兴”运动，其起因是二战后以美国为楷模发展起来的德国经验主义社会学，与战后陆续从美国返回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所倡导的批判理论发生了严重抵牾，从而导致了一场长达十年之久关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争论。由于参加论战的两派领军人物都是当今学界泰斗，加之其中的几个主要论题——社会科学的逻辑问题（卡尔·波普尔与阿多诺对垒）、社会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帕森思对马尔库塞）、晚期资本主义问题（达伦多夫和硕依西对阿多诺）——直接或间接都源于对韦伯思想的理解，对这些重大问题展开深入的研讨和辩论，其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了社会学一门学科的范围，对当代整个社会科学界都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作为这场论战的结果，一方面加快了韦伯思想的传播，促使韦伯思想研究热潮的升温，另一方面也对美国社会学界长期以来以帕森思为代表的对韦伯思想的经验主义解读——“帕森思化的韦伯”——做了正本清源、去伪存真式的梳理。譬如，在帕森思式的解读中，韦伯丰富而深刻的社会多元发展模式之比较的历史社会学思想，被歪曲地比附成线性发展观之现代化理论的例证或图示。因此在论战中从方法论上揭示韦伯思想的丰富内涵，还韦伯思想的本来面目，亦即“去帕森思化”，这正是“韦伯复兴”的题中应有之意。

随着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腾飞，研究韦伯的热潮开始东渐。二战后特别是六十年代以后，传统上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台湾、香

港、新加坡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四个地区，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成为国际学术界共同关注的课题。美国的汉学家曾就“儒家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于六十年代先后在日本和韩国召开了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八十年代初在香港也举行了“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国际学术会议，其中的中心议题就是探讨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起飞的关系。许多学者都试图用韦伯的宗教观念影响经济行为思想去解释东亚经济崛起和现代化问题：有将“宗教伦理”视为“文化价值”者；也有人将“儒家文化”作为“新教伦理”的替代物，在解释东亚现代化时把儒家传统对“四小龙”的关系比附为基督教对欧美、佛教对东南亚的关系；还有人将韦伯论述的肇源于西欧启蒙运动的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推展至西方以外，譬如日本，等等。所有这一切，无论赞成者抑或反对者，都使亚洲地区围绕东亚经济腾飞形势而展开的文化讨论，与对韦伯思想的研讨发生了密切关系，客观上推动了韦伯著作的翻译出版和思想传播，促使东亚地区韦伯研究热潮的出现。

作为欧洲文明之子，韦伯是一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同时其中也充满了许多歧义和矛盾，许多相互抵牾着的观点都可在他那里找到根源，因而时常引起不同诠释者的争论。历来对韦伯思想的理解大致可分为两派，即文化论和制度论。前者主张思想、观念、精神因素对人的行动具有决定作用，故而韦伯冠名为“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这一卷帙浩繁的系列宗教研究（包括基督新教、儒教、印度教、犹太教等）是其著作主线；后者则强调制约人的行动背后的制度原因才是决定的因素，为此它视《经济与社会》这部鸿篇巨制为其主要著作。这种把一个完整的韦伯解析为两个相互对立部分的想法，从韦伯思想脉络的局部上说似乎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但整体看来都有以偏概全的偏颇。须知，韦伯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观念论者或文化决定论者，更不是独断意义上的唯物论

者，因为这里的宗教观念是通过经济的伦理对人的行动起作用，并非纯粹观念在作用于人；而制度因素既包含经济制度、也包含法律制度、政治制度，还包含宗教制度、文化制度，并非只是经济、物质、利益方面的制度。换言之，一般理解的观念—利益之间那种非此即彼、对决、排他性关系，在韦伯的方法论看来纯属社会科学的“理念型”，只有在理论思维的抽象中它们才会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它们从来就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彼此包容的、即所谓的“镶嵌”关系。应该运用韦伯研究社会的方法来研究韦伯本人的思想，放大开来，应该用这种方法看待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事物，惟有如此，才能持相互关系的立场，以“有容乃大”的胸怀解决现实中许多看似无解的死结问题。

欣闻台湾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与大陆出版机构合作，在内地携手出版《新桥译丛》中有关韦伯著作选译的简体字版，这对于两岸出版业界和学术界的交流与沟通，无疑将会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祝愿这一合作不断发展壮大并结出丰硕的果实！

在中文学术界，台湾远流公司出版的《新桥译丛》有着很好的口碑，其译作的品质精良是远近闻名的，其中韦伯著作选译更是为许多大陆学人所称道。究其原委，一则是书品优秀，这包括书目及其版本的选择颇具专业学术眼力，另外新桥的译文具有上乘水准，是由经过专业训练的学者基于研究之上的迻译，而非外行人逐字逐句地生吞活剥。仅以两岸都有中文译本的《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而论，远流本初版于1989年，六年后再出修订版，书中不仅更正了初版本的一些讹误，而且将译文的底本由初版的英译本改以德文原著为准，并将英、日文译本添加的译注和中文译本的译注连同德文本作者的原注一并收入，分别一一标示清楚。此外，远流版译本还在正文前收录了对韦伯素有研究的康乐先生专为该书撰写的“导言”，另将美国匹兹堡大学著名华裔教授杨庆堃先生1964年为该书

的英译本出版时所写的长篇“导论”译附于后，这就为一般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使这个译本的学术价值为现有的其他几个中译本所望尘莫及。再则，《新桥译丛》的编辑出版已逾二十余载，可谓运作持之以恒，成果美不胜收，仅韦伯著作选译出版累计已达十几种之多，形成规模效应，蔚为大观。不消说，这确乎需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编译者团队专心致志、锲而不舍地坚持长期劳作才能做到，作为一套民间出版的译著丛书，在今日台湾这种日益发达的工商社会，实属难能可贵。现在，两岸出版业界的有识之士又携手合作，将这套译著引介到内地出版，这对于提高这套丛书的使用价值、扩大其学术影响、推动中文世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提升学术研究水平，功莫大焉。

近年来，随着两岸经贸往来规模的不断扩大，两地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交流也在逐步深入，相应地，两地学者的著述分别在两岸出版的现象已屡见不鲜，这对于合理地使用有限的学术资源，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同提升中文学界的研究素质，可谓事半功倍。进而，倘若超越狭隘功利角度去看问题，将文本视为沟通思想、商谈意义的中介，从而取得某种学术共识，成为共同打造一个文化中国的契机，则善莫大焉。

诗云：“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惟愿两岸学人随着对世界文化了解的日益加深，中文学界的创造性大发展当为期不远矣。是为序。

2003年12月3日 于北京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增订版序

钱永祥

《学术与政治：韦伯作品集 I》的第一版于 1985 年出版，迄今已经六年有余。大概是因为当时正逢所谓的“韦伯热”在台湾流行，所以初版很快便告售罄。几年来，出版者频频要求继续印行上市，偶尔也有新一代的学生抱怨欲读此书却无法觅得。但笔者始终希望一本负责的态度，待初版的编译内容有所改进后，再以修订版的形式与读者见面。惭愧的是，由于笔者疏懒成性，以及个人研究工作的牵掣，修订工作延续了三年之久。这种属于另外一个时空环境的工作效率，在今天的台湾居然有其可能，必须感谢本册的其他译者、本选集的主编康乐先生，以及远流出版公司的王荣文先生和罗丽芳小姐的宽容与耐心。

这个修改增订版与初版的不同，大概有下列三方面。

首先，我们用施路赫特的《价值中立与责任伦理——韦伯论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作为本册导言，取代初版的导言——阿宏的《韦伯论学者与政治家》；阿宏此文现在移作附录。施路赫特这篇文章对韦伯两篇演讲的论证结构有极为细腻深入的分析 and 重建，并取韦伯

的观点与晚近社会理论关于知识与政治实践的一些新反省对观,可望对读者提供较多的帮助。

其次,我们将初版的全部译文,与原文对勘一遍,做了许多修改与润饰,以期在忠实与可读两方面能胜过初版旧译。顾忠华先生曾对原译文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对这次修订工作助益极大。修订过程中,笔者也曾参考马克斯·韦伯著,王容芬中译,《学术生涯与政治生涯——对大学生的两篇演讲》(北京,1988),以及收在 Peter Lassman & Irving Velody, eds., *Max Weber's 'Science as a Vocation'* (London, 1989) 中 Michael John 执笔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新英译。对照之下,笔者相信,就韦伯的两篇演讲而言,本书在台湾读者较易利用的中英文字版本之列,可能是比较忠实而且比较有用的一个译本。

第三,我们将韦伯的一篇政论小文章《论帝国总统》,收入本书作为附录,希望让读者浅尝略窥韦伯的论政态度。这篇中译当初在《当代》杂志发表时,笔者曾撰简短的导言,除了说明韦伯晚年论政的局势背景之外,尚企图将韦伯的政治思考方式联系到最近台湾的若干现实政治争议上来。在这样做的时候,这篇导言的某些措词难免暴露急切之情,与本书的编译体例相当不合。不过,几经考虑之后,我们仍将这篇导言照原来模样收入,藉以突显韦伯的政治关怀在今日台湾依然有其鲜活的参考价值。

当然,经过这些修改增补,并不代表本书已经近于理想。数年来,笔者虽然未曾针对韦伯进行专题研究,却仍然利用机会陆续阅读了不少关于韦伯之生平、政治思想、以及师友交谊(特别是他与卢卡奇的关系)的二手著作,深知本书所提供的《韦伯小传》以及《韦伯的政治关怀》何等不足。在翻译方面,一些段落的论证理路仍然不明朗清晰,一些关键词眼仍然无法找到较为贴切的中文对等字词。此外,原文中出现的几个典故、人物,也一直未曾找到出处或资

料。这些缺陷和疏漏，恐怕要俟诸下一代资源更丰富的学者来弥补了。

这个修订版完稿之时，台湾正在内外交迫的困局中呈瘫痪之象；旧的秩序已经崩溃，新的秩序却仍无头绪。经验似乎显示，我们的价值反省能力尚无足以设定新的目标，而我们从事切事政治经营的能力，也不敷摆脱困局、开创新机之需。在这个关头，本应扮演纯粹超导体角色的翻译者，竟敢奢望他的翻译工作可以供这个社会多一个学习的机会，自然不会在意横遭非分托大之讥！

1991年10月

译 例

1. 本册各篇文章的出处及译者、修订者姓名,请见各篇之前的说明。

2. 各篇文章中凡以黑体字印出者,皆为原文加重语气之字词或句子。

3. 凡在〔 〕内之字句,皆为原文所无,而由编者或译者添加。

4. 中文书名、论文以《 》示之;外文书名以斜体字示之,论文以“ ”示之。

5. 除另有说明者外,注释皆系编译者所附。书中出现之人名,请读者另查本册卷末之人名注释。若干人物、事件、典故、引句难考其详,无法作注,尚请识者指教。

6. 《韦伯传》指 Marianne Weber, *Max Weber. A Biography*,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1975);《经济与社会》指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ed. Guenther Roth & Claus Wittich, 2 vols (Berkeley, 1978)。

7. 基督教《圣经》之经文引录,悉以下列诸中译本为准:思高圣经学会译释,《圣经》,(北平,香港,1946—1961);《圣经》,(台湾圣经公会,1983);意译本圣经会,《今日圣经》,(台北,1980)。

目 录

序 言	苏国勋
增订版序	钱永祥
译 例	11

《韦伯作品集》导论

第一章 韦伯小传	3
第二章 韦伯的政治关怀	45
第三章 韦伯的学术	67

学术与政治

导言 价值中立与责任伦理——韦伯论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101
第一章 学术作为一种志业	153
开场(155) 年轻学者学术生涯的外缘条件:德国与美国(155) 学术	

研究机构的“国家资本主义化”(157) 学术生涯中的机运问题(158) 学者与教师的难以得兼(159) 学术生涯外缘条件的总结(161) 学术的专业化(161) 灵感在学术工作中的位置(162) 当前流行的“人格”论(164) 学者的“人格”(165) 何处寻觅学术工作的意义(165) 理化化的主要意义(167) 进步与死亡的意义(168) 学问的价值——问题的提出(169) 前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170) 概念的发现之意义(170) 理性实验的兴起(171) 近代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171) 学问的价值作为学术工作的预设(173) 价值预设与各类学科的关系(174) 政治不属于课堂(176) 为什么政治不属于课堂(177) 学术求于信徒者——一个例子(177) “令人不快”的事实(178) 价值的多神论(179) 美国年轻人对教师的态度(181) 教师不是领袖或生命导师(182) 教师对学生的“生命”所能提供的帮助(183) 对学问的认定和献身(185) 教师扮演先知的徒然(185) 神学的预设——理知的牺牲(186) 学者没有牺牲理知的权利(189) 面对“眼下的要求”(190)

第二章 政治作为一种志业 193

开场(195) 政治的初步界定(195) 国家在社会学上的定义(196) 政治的定义(197) 正当性的三种纯粹类型(198) 卡理斯玛型支配(200) 从支配者到支配运作的资源(201) 支配之经营的两项要素——人与物(201) 人的因素:行政僚属(201) 物的因素:行政工具(202) 身份制政治团体(203) 君主拥有行政工具(203) 近代国家对行政工具的收夺和垄断(204) 新型职业政治家的出现(205) 政治作为副业与政治作为主业(206) “为了”政治而活和“依赖”政治而活(207) 资产对职业政治家的意义(209) 专业官僚的兴起(212) 首席政治家的出现(213) 政务官吏和事务官吏(216) 职业政治家的性格和类型(218) 僧侣(218) 文人(218) 官廷贵族(219) 士绅(219) 法律家(219) 律师和官吏的不同性格(222) 官吏和政治家的不同性格(223) 群众政治家(225) 新闻工作的特殊地位(225) 新闻工作者的缺乏余裕(227) 新闻工作的政治前途与艰辛(228) 党工(229) 政党经营形态的起源(230) 政党在英国初起时的形态(231) 政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233) 政党组织的独立和强化(234) 党工的期待(235) 政党新旧形态之间的冲突(236) 早期英国政党的组织(237) 党务会的崛起(238) 新式政党机器在几个方面的影响(240) 英国新式政党机器下的领袖(241) 早期美国政党的发皇(242) 猎官制

(242) 党老大(243) 美式官吏制度的变化(245) 在德国政治工作的三项基本态势(246) 德国政党的望族派系倾向(247) 新式政党机构的出现和领袖的关系(249) 领袖民主制的前景和机会(249) 志业政治家的出路(251) 政治作为志业的心理意义(251) 志业政治家人格上的条件(252) 虚荣的破坏力(253) 信念以及价值对政治行动的意义(254) 政治的道德地位(255) 自鸣正义的道德和责任的道德(255) 道德和政治的离与合(256) 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259) 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紧张关系(262) 用目的来圣洁化手段的困难(263) 恶的存在之事实(264) 伦理的多元论(265) 以武力为手段的后果(268) 志业政治家应有的警觉(269) 能以政治为志业的真人(271) 艰苦前途的考验(272) 政治作为一件工作的真义(273)

附 录

第一章 韦伯两篇演讲发表的日期	277
第二章 韦伯论学者与政治家	285
第三章 韦伯论帝国总统	307
译名对照表	315
索 引	337